



李景端 著

我与译林

——
半生书缘一世情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李景端 著

我与译林

——半生书缘一世情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与译林：半生书缘一世情 / 李景端著. -- 南京：
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18.5

ISBN 978-7-214-21085-2

I . ①我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 . 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75116 号

书 名 我与译林——半生书缘一世情

著 者	李景端
责任编辑	曾 偲
责任校对	王翔宇
责任监制	王列丹
出版发行	江苏人民出版社
装帧设计	黄 炜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pph.com
电子邮箱	http://www.jspph.com
照 排	江苏凤凰印刷数字技术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652毫米×960毫米 1 / 16
印 张	16.75 插页5
字 数	227千字
版 次	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14-21085-2
定 价	42.00元

江苏人民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。

自序

说说我这人

自序

我当然是个凡人。不过在平凡之中，也许又比别人多了几样与众不同的经历。比如说，抗战时期曾骑着马上初中的“小少爷”，在“文革”中下放农村时，照样住茅屋、拾粪种地。只读到高二上学期，仅凭复习一本《大学升学指南》，竟考上上海交大运输系和清华大学经济系；又因院系调整，四年连上四所大学，1954年终于从中国人民大学外贸系毕业。毕业后先后在外贸部、农产品采购部、全国供销合作总社、商业部等中央机关和江苏省手工业管理局工作，当过化工厂化验室主任和县委宣传部通讯报道员，还在农村插队五年，像这样典型的“万金油”干部，怎么会成为专业的出版人？前半生与翻译和外国文学毫不沾边，42岁才起步，何以这么短时间内，会成长为翻译出版界的里手，甚至被溢誉为“翻译出版家”？

不仅上述经历有点特殊，我的出版生涯中，还遇上或者做了好些应该算是不寻常的事。比如，我这个无名小辈，居然能请到钱锺书、杨绛、戈宝权、卞之琳、萧乾、冯亦代等几十位文坛大师担当《译林》的编委。我才办刊第一期，就挨了外国文学权威一棍，引发一场“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风波”，甚至惊动当年主政的中央领导同志。再比如，我率先冲禁区，引

进介绍西方当代通俗文学；迎难而上，推动翻译出版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《尤利西斯》等当代世界名著，填补了我国的文学翻译空白；提出“开放翻译家”的概念，肯定和弘扬他们在推动思想解放上的开放精神。此外，我不断发声谴责翻译抄袭，投身翻译打假，上法庭为翻译家维权打官司，如此等等。这些多少有些不寻常的经历，造就了我中年后处于不断挑战中的人生。这种经历，有人称之为“传奇”，有朋友又戏称是“爱折腾”，也许都有理。我自己想，还是归结它为“丰富”吧。

回首逝去的岁月，重拾走过道路的足迹，回味一下这些“丰富”实践中的忧喜愁乐，这或许也是对编辑工作的一种自我反省。在我的心目中，一个优秀的编辑，必须具备“四多”。即：编的好书多；各行朋友交得多；组织的活动多；自己的研究成果多。我希望本书能对照“四多”的要求，从中给自己的编辑生涯画出一张像，并通过它，把我从事编辑工作所感受到的快乐，传递给我的朋友和读者，让更多的人，了解、尊重和爱护编辑。

本书尽量用故事来反映历史，全书以新故事居多。对有些老故事，因为它是史料，回首往事时难免再次提到。但我也会从新的视野去回顾，并努力补充新的内容。书中有少量选收他人对我的评说，其中

赞誉多，批评少，那只是对我的一种客气勉励，绝不意味我有多么完美，更不是我有意借以自诩。书中提到的人和事，有的因年代已久，有的可能传闻有误，以至或有冒犯失敬之处，尚望宽宥见谅。江苏人民出版社，是我最早踏入出版行业的“娘家”，如今能在“娘家”出书，备感荣幸和高兴。谨向徐海社长及责编曾偲，道声谢啦！

2018年3月31日

目 录

自序：说说我这人

半路出道当编辑

- 闯三关才入编辑门 /003
- 走通俗，办《译林》歪打正着 /005
- 顶住封杀，坚持“打开窗口” /009

《译林》建社，再上一层楼

- 敢为人先，第一个“吃螃蟹” /019
- 做英语教辅，壮大经济实力 /029
- 勤搞活动，增强社会影响力 /031

出版界“译林现象”

- 大步改革，转型成功 /037
- 全国文艺社七连冠 /040
- “译林现象”的形成 /042
- 李景端出版理念研讨会 /045

编辑人脉是重要的出版资源

- 编辑如何交朋友 /053
- 如何与出版高层交往 /056

怎样赢得大家名家的信任	/079
出版同行是友不是敌	/153
与媒体成为朋友	/163

老编辑的下半场

编辑眼光评说出版	/173
翻译编辑争鸣翻译	/195
抨击唯利坚守文化	/218
呼唤正义发声维权	/232
退休不厌管“闲事”	/245

半路出道当编辑



译林建社展览

闯三关才入编辑门

1975年1月，时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的高斯同志，把我从下放的泗阳县调回出版社当编辑，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。从此，我结束了前半生当“万金油”干部的历史，幸运地走进了崇高的编辑队伍。

起初分配我到科技组，参与由全国多家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《外国历史》及《外国地理》丛书的工作。我接手的任务，是介绍索马里等6个东非国家的地理。面对翻译图书，又是很专业的外国地理，我真是一无所知，只好边学边干。头一件事就是寻找外文翻译版本。上北京跑了好几家有关的图书馆，经过馆际互借渠道，好不容易借到两本。那时许多外语人员没事干，译者不难找。难的是，交稿后我怎么编？不仅地理专业不懂，连出版基本知识也外行。后来知道，书稿内容可以请外审，我主要处理版面、体例、装帧、文字等编辑事宜。说实话，当时就连这些我也陌生。连忙找了几本编辑出版书籍，匆匆补课充电。如今回想起那种临时抱佛脚的窘态，至今还觉可笑。

编书时，我想，既然专业内容外审过了，我起码要认真把好

文字关，别让它出错字才行。于是看稿特别认真，那时都是纸样校对，连校对符号也得先学。尤其地理书，涉及天文、地质方面的冷僻字又多，凡遇没把握的字，必查词典。好在我常年在机关当秘书，写惯了总结报告之类公文，对使用文字多少有点基础，这对做书稿校对工作，还是有一定帮助的。编辑两本地理书，严格地讲，只是做了两本书的文字校对工作，但却是我编辑生涯难忘的入门第一关。

才干一年，遇上唐山大地震。针对社会上人心惶惶，我想到，有必要宣传普及有关地震的常识。经过半年多紧张努力，策划出版了《地震及其预测预防》一书。接着我又以这本书为蓝本，写出连环画的文字脚本，请画家配画。不到半年，一本通俗解说地震的连环画《地震预防》问世了。当时书店里有关地震的书几乎是空白，这两本江苏人民版地震科普书，一下子行销省内外，多次重印，累计发行了几十万册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相当好。通过这件事，使我初步懂得，当编辑如何抓住时机出畅销书的道理，也算是我接受编辑启蒙的第二关。

第三关是学习组织作者队伍。根据国家“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”，江苏除承担《汉英词典》等6种外语词典的编写出版任务之外，还参与了由上海牵头、华东五省一市协作编写《汉语大词典》的工作。为此，省里成立了“中外语文词典出版领导小组”，其办事机构就设在江苏人民出版社。这个“词办”除一位挂帅领导外，做实际工作的就我一个人。《汉语大词典》是一部超大型工具书，工程浩大。为落实江苏承担的任务，我主张省内分别组织10个编写组、每组6至10人，分头编写。那个年代，没有稿费，要空手组织近百名语文教师，基本上脱产编词典，谈何容易！好在依靠软劝硬磨的磨劲，终于把编写队伍建立起来了。《汉语大词典》最后圆满成功出版，江苏的贡献无疑值得肯定。

在“词办”干了两年的经历，使我了解到不少编工具书的知识，也结识了教育界许多朋友，更学到了跟不同作者对象打交道、组织作者队伍的经验。以上这三关，是我编辑生涯起步的深切体验，虽然历时短暂，但使我终身受用。

走通俗，办《译林》歪打正着

1978年初，高斯局长要我考虑，办一本介绍外国现状的翻译刊物。我觉得，介绍外国社会科学，内容敏感有风险，不如介绍外国文学。这个主意得到了高斯支持。当时我真是白手起家，因为我前半生跟文学和翻译都不沾边，对照办刊条件，我没有一项符合。省出版局原副局长高介子，有一次对我说：“当年高斯挑你这个外行办《译林》，真是冒风险；而你敢接手，胆子也够大。”这话一点也没错。如按时下时尚的用词来说，当年高斯和我，“都没按常规出牌”。

既立下“军令状”，只好硬着头皮上，首先想刊名。有一天我同搞古籍的编辑孙猛聊天，他无意中提到“译林”两个字，我听了一震，脑子里顿时想起林茂叶繁的景象。啊！用“译林”做刊名多好呀！《译林》后来走红，少不了孙猛偶然起名的功劳。

刊名定下之后，接下来要给刊物定位。当时北京有《世界文学》，上海有《外国文艺》，都是大户老牌。我觉得，《世界文学》面孔太板，严肃得让人“不想靠近”；《外国文艺》又新奇超

前得让人看不懂。咱不能重复走他们的老路。我从读者的角度，有一个朴素的期盼，就是文学杂志，内容要有新鲜感，故事一定要吸引人，抓住好看耐看，才有生命力。我认准了《译林》就是要面向草根的偏爱，走介绍通俗文学尤其是西方当今流行小说的道路。

我对自己办刊的先天不足，是有自知之明的，所以曾向本地大学一位搞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年教师请教。哪知这位老兄，既傲慢又有“野心”。他直率地告诉我：你们出版社在外国文学方面，既无专业人才，更无必要资料，单靠你们自己，肯定搞不起来。不如把刊物编辑部设在我们大学，我们编好后，给你们出版。我一想，这么干，这本杂志岂不成了主要发表他们研究成果的专刊了，这跟我的想法完全不同，自然拒绝了。

我决定我们自己来编。也许正因为我是外国文学外行，又是办刊物新手，那时还不懂得提方案、搞论证、先试刊、再定性这一套程序，只想着尽快上马，早日问世。因为心里没把握，最早的《译林》，只是用书号出版的“丛刊”，暂定每季出一本，想出版探路后，看反应再做调整。



《尼罗河上惨案》封面

编《译林》创刊号，起初只有我和新编辑金丽文两个人。我负责向北京组稿，她负责向南京和上海组稿。那时影院放映的英国影片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很红火，说也凑巧，我们得悉上海外语学院有位英语教师，正在翻译这部影片的文学原著，我觉得这是个机会，立即派金上门约稿，并敲定交稿时间。当时根本没考虑这是一部侦探小说，更没料到这部小说后来会给《译林》惹上那么大的麻烦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创办《译林》，无论是选人、选材，还是定位、运作，确实是风险与机遇并存。对我这个外行来讲，难免有“歪打正着”的幸运。就连高斯也在多年之后表示，《译林》的意外成功，使他存有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感觉。

《译林》这种独辟蹊径的办刊方针，正好适应了中国百姓因长久禁锢而渴望了解西方当代文化的愿望，以至一创刊，就大受读者欢迎。创刊号16开、240面，定价才1元2角，比一本书还便宜。最早是交给新华书店零售，初版20万册几天就脱销，加印20万册很快又卖完。书店要求再印40万册，考虑纸张供应紧张，只再印20万册后就不印了。因为书店不办理长期订阅，店面又买不到，大批读者只好汇款向编辑部邮购。头一两期，邮局送来的邮购汇款单，都用大邮袋装，一次就送来好几袋。邮局职工抱怨说，为了登记这么多汇款单，害得他们加了好几天夜班。社里邮购部同志也叫苦，仅为《译林》办理登记、取款、入账、包装、寄发等手续就忙不过来，对其他书的邮购，这时都顾不上了。

后来得知，许多大学图书馆陈列的《译林》，因为阅读的人太多，不是被翻毛了看不清字，就是翻烂了造成缺页，有的干脆被人拿走，所以急着要求补购。最有趣的是，黑市上《译林》每本要卖2元，还要外加两张香烟票。如今城市里四五十岁的人，尤其是80年代的大中学生，几乎很少有人不知道《译林》。有一次我去医院看病，将病历摆在医生桌上排队。谁知他看到我的病历上填写的单位是《译林》，就抽出来叫我先去看。真没想到，我还会如此沾上《译林》的光。

《译林》意外走红才高兴几个月，不料一阵狂风猛烈地向我们

袭来。原来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，于1980年4月7日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长信，对江苏出版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《钱商》《医生》《珍妮的肖像》和浙江出版《飘》这样的欧美通俗文学，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。信中指出说：“自‘五四’以来，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。”“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。”“希望出版界不要趋‘时’媚‘世’。”胡乔木同志将这封信，加了批语转发给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“研究处理”。这种批转给省委“研究处理”之举，表明《译林》摊上大事了。

幸好高斯同志表态，介绍西方健康的通俗文学没有错，有责任由局党组承担。加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我们党正在清算长期留下来“左”的流毒，对文艺实行“不扣帽子，不打棍子，不揪辫子”的“三不政策”，又经过胡耀邦同志的过问，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一场风波，没有追究，“就到此结束”。《译林》惹上的祸，总算有惊无险地过去了。事后有朋友向我开玩笑说：“冯至这封信，惊动中央，震动全国，真是给创刊的《译林》，做了一次大广告。”

顶住封杀，坚持“打开窗口”

这场风波事后，《译林》虽然没有受到组织处理，但因为冯至先生的信中，还对《飘》《钱商》《医生》《珍妮的肖像》等美国流行小说严加指责，说这些“红红绿绿”，“都是供人在旅途上消遣，看完就抛掉的书”；批评出版社“除去为了赚钱以外，我得不到任何的解释”。类似看法，在外国文学界部分人士当中也有。为了反驳这种观点，消除对外国通俗文学的偏见，我觉得不应沉默。对于违背时代发展的过时看法，即使是权威人士所讲，也应该争鸣。于是，1980年3月，我在《译林》总第2期上发表了《试评美国当代小说〈钱商〉》一文，强调介绍这样的文学作品没有不当。文章说：

《钱商》不仅对跨国公司为转嫁危机所使用的利诱、腐蚀、威逼、欺诈等卑劣的手段，做了一定揭露，而且把美国一家大银行几乎倒闭的原因，归咎于跨国公司的投机，这就在暴露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方面又深了一步，触到了国际垄断资本贪婪、掠夺的本质。小说对这一点有相当